人口的增长、流动和集聚：七普数据的一些解读

文 | 郭晓菁、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5 月 11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主要数据结果。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为 141178 万人，与 2010 年六普 133972 万人相比，增加 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57%下降 0.04 个百分点。2020 全年出生人口 1200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8.50‰，出生人口连续三年滑落，总和生育率为 1.3，处于世界的较低水平。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07，与 2010 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3，较 2010 年下降 6.8。

今年关于流动人口的数据，有两个方面值得分析：一是流动人口的增长规模，二是流动人口的省际分布。过去十年来，全国总人口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发生了爆炸式增长，并且主流从城-乡流动逐渐转向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

#1 流动人口继续快速增长

根据人口普查的定义，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包括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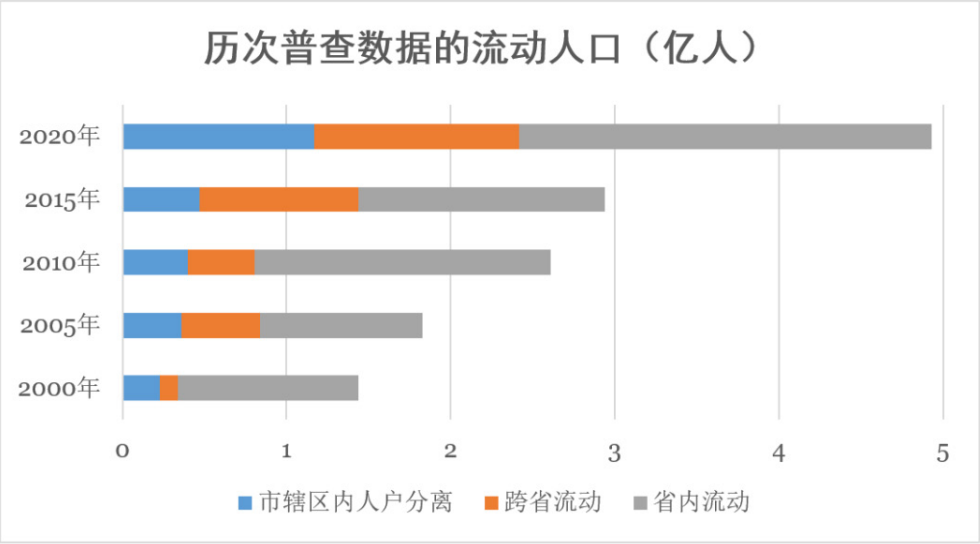
根据七普数据，人户分离人口为 49276 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 万人，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192.66%，流动人口增长 69.73%。这意

欢迎关注陆家嘴评论

出品单位：

SIFL INSTITUTE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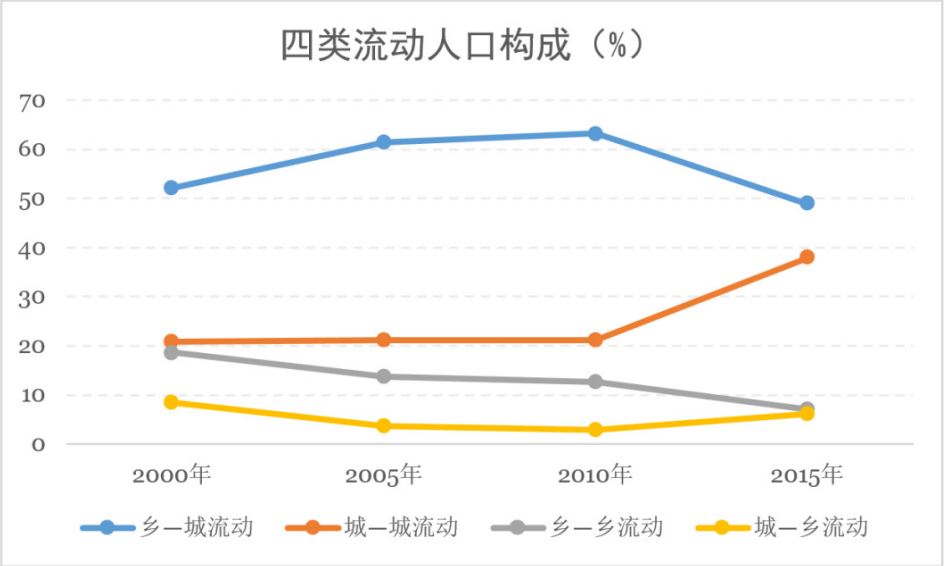
味着，我国 14.1 亿总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离开户口所在地，在异乡长期工作、生活，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她的户籍并没有迁往现在的居住地。



数据来源：五普、六普、七普数据以及 2005 年、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小普查”）

对比历次普查数据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数据，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第一，城城流动人口的比重在几年内大幅提升，一直以来，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是从农村迁往城市，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 年时，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42 亿人，而外出农民工为 1.23 亿人；到 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86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 1.70 亿，10 年间，外出农民工仅增长不足 0.5 亿人，尤其是 2015 年以后，外出农民工规模几无增长。由此可见，七普相对六普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的 1.56 亿人，可能主要是由城城流动人口构成，但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是 2015 年全国 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不准，还是 15 年之后到现在发生了新变化？城城迁移的机制与乡城迁移的原因有很大差异，这是城市化进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的新趋势。



数据来源：段成荣等，2019，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人口研究，2019 年第 2 期。

第二，和六普数据相比，七普的市辖区人户分离的人数增加了近两倍，这样大幅度的增长是扩区所致，还是其它原因导致了市辖区内的人口流动？为什么在市辖区内人口倾向于居住地和户籍地分离，而不将户籍迁往居住地？这些都需要新数据加以解释。

从分省常住人口的变动来看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经济和城市化发展不断深入，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十年里，人口增速有所下降，但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从流动方向看，人口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心城市为主的城市群集聚特征，西部地区的人口也有所上升。人口流动的另一个特征是，从原来的乡—城为主到现在城—城流动比例大幅上升，尤其是中西部省内迁移越来越向省会等中心城市集中，成为人口迁移的新现象。城城流动以后，已经城市化的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不会改革，从而进一步体现了城市群的集聚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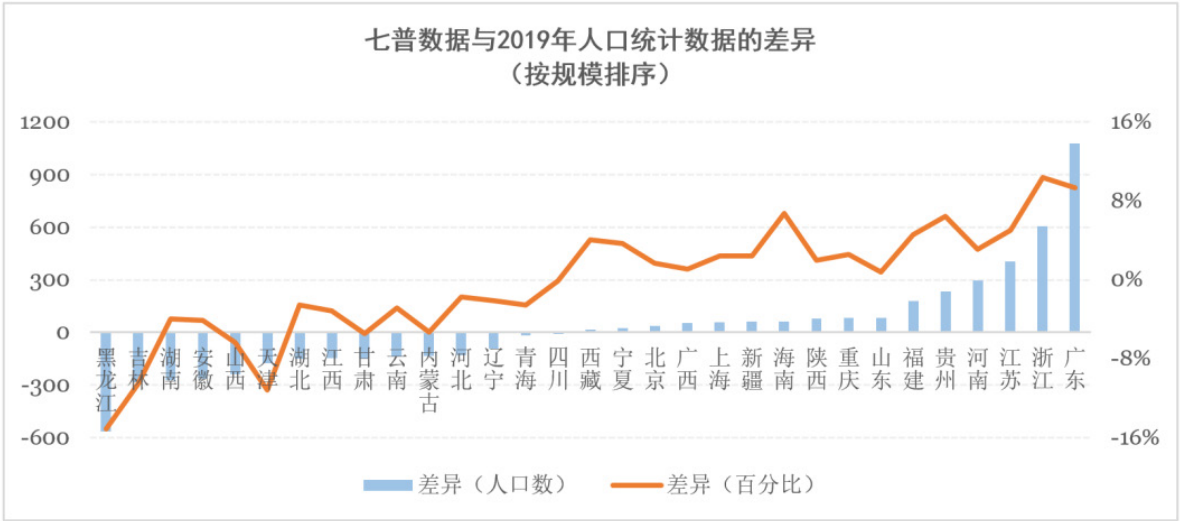
但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其相对六普，新增的流动人口、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较小，很多学者从中得出结论，人口迁移的增速面临拐点，农民工返乡、就近就地城镇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但从七普数据来看，2015 年小普查流动人口数据的准确性没有很好的刻画人口迁移的趋势，人口流动的活跃度依然很高，目前尚且不知道，人口迁移的规模是否到达了拐点，未来人口迁移的变化是向上增长，还是向下滑落，这些都需要未来通过更丰富的七普数据进行释疑。

人口流动性的快速增长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不仅要工作，也要生活。尽管绝大多数工作岗位不再以户籍作为门槛，但在很多情况下，户籍身份仍然是获取当地公共服务的重要标识，而这些公共服务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伴随着生命历程中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推动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但很多完成城市户籍转化的人口会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他们依然会因为户籍被拦在本地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同时市辖区人户分离过于普遍，即便是在同一个市，这些人在孩子学区入学等问题上所受的待遇也往往与外来人口无异，这也意味着以户籍为主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比想象的要更大。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加大，但调整落实的速度和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依旧不相匹配，户籍制度所附加的种种限制依然阻碍着流动人口在当地长期居留和进行相应的生活规划，进一步影响当地城市的政策选择和未来发展空间。

#2 人口省际分布呈现马太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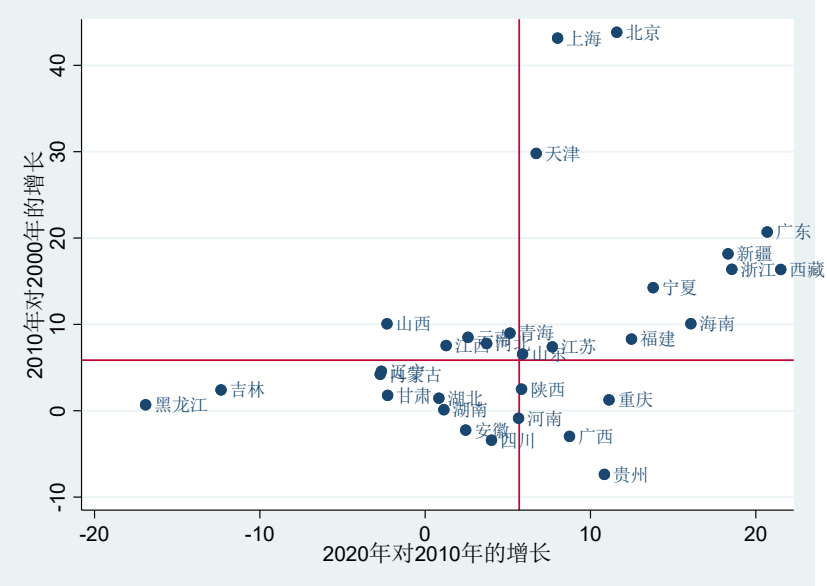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七普数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0）》。按人口规模差异的大小进行排序。蓝色柱形图表示人口规模数量，对应左侧数轴，橙色折线图表示差异规模占统计年鉴估算规模的比重。

在人口自然增长呈现低速的背景下，快速增长的流动人口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2.15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0.79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 0.22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 1.20 个百分点。

具体到各省市，我们将七普公布的各省区常住人口数据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0）》公布的 2019 年末各省区常住人口进行比较，观察各省区常住人口的高估与低估情况。即便是考虑到在统计年鉴截止的 2019 年末到七普以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点期间的人口可能的流动规模，这两个数据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多年来人口持续净流入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大多存在低估现象，比如七普中广东多了 1080 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合计多了 1012 万，而人口持续净流出的省份，人口萎缩规模比非普查年份数据显示的更大，比如黑龙江和吉林分别减少了 566 万和 283 万人。

七普数据反映出，中国人口的集聚程度比人们想象得要更高，各省市之前的统计年鉴所估算的数据存在一定误差。这一现象是符合常规的认知的。



数据来源：五普、六普、七普数据。图中的红线分别为两次普查的十年间 31 省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平均值，2000 至 2010 年间为 5.86%，2010 至 2020 年间为 5.69%。

王桂新等（2012）基于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总结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的迁移模式，人口的迁出和迁入都呈现了更强的集中化趋势，即“强者恒强，强者更强”。

根据五普、六普、七普的各省市人口数据进行绘图，可以直观地看到21 世纪前两个十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变动的情况。图中的红线标志了全国所有省市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其中第一象限（右上）和第三象限（左下）的省市最为典型，第二象限（左上）和第四象限（右下）的省市较不典型，说明在人口的流动和集聚上，普遍存在“强者恒强”的现象。

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市，在 2000 年-2010 年、2010 年-2020 年两个十年期间的人口增速均高于平均，其中位于上方的北京、上海、天津，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但在 2010-2020 年间人口增速明显放缓，最近十年，人口增长的热点转向广东、浙江、新疆、西藏等东南沿海和西部省市。位于第三象限中的省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人口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东北省份人口持续流出，黑龙江、吉林在过去的十年内人口萎缩速度明显加快。

目前七普公布的有限数据显示，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未变，前述判断整体依旧成立，城市级别的人口变化还需要后续省市县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进行验证。